

人文齐鲁

与革命结缘的东方书社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日子里,我很怀念济南院西大街(今泉城路)芙蓉街南口对过的东方书社(后易名中图发行公司、新华书店门市部)。

□陈建伟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还是戴着红领巾,把“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高尔基语)、“我尚能生存,我仍要读书”(鲁迅语)记在小本本上的学童,课余时间常与三二“恰同学少年”来到东方书社。书店里年龄大一些的店员,从口音上听得出多来自老革命根据地的胶东,他们待客都是和颜悦色有问必答。图书分三面墙按类摆放,全部开架售书,新书摆在中间几个方形大书台上随意翻阅。我们在店里浏览一圈后就来到西北隅的期刊专柜,如饥似渴地翻阅氤氲着墨香的杂志。记得常读的杂志有《少年文艺》、《大众电影》、《新观察》、《展望》等。

由于地处老城区闹市,周围

学校多,东方书社成了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每到课余时间或假日,宽敞的店堂常常是人流如织,读者盈门。我小学就读时的小韩老师(韩美林先生)当时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他也是东方书社的常客呢!

也许是受东方书社的启蒙,后来我与书刊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位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老发行”那里,我了解了东方书社一段鲜为人知的光荣历史。东方书社建于1929年初,由山东荣成人王晚蓼先生创建,店名是王晚蓼与山东著名教育家鞠思敏、王祝晨商定的。因济南甫经历了1928年的“五三惨案”,其寓意一是“东启明,睡狮猛醒”,唤起民众反对外来侵略的意识;二是考虑济南是名士荟萃之地,“以文会

友,以书结社”也是顺理成章,于是东方书社应运而生。

东方书社以济南为基地,先后在北平、上海、西安、重庆、成都、汉中建立分社,以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上世纪30年代,济南东方书社为躲避官方检查,把一些宣传革命的进步书籍藏在店后面的仓库里,遇到熟悉的读者才秘密出售。在成都,冯玉祥、郭沫若、巴金、老舍都曾光临东方书社阅览、购书。著名学者教授李长之、姚雪垠、顾颉刚等都是东方书社的座上客。东方书社的同仁在日伪统治年代,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游击队运送纸张、油墨、油印机、蜡纸等急需物资。王晚蓼先生通过关系机智勇敢地营救了不少中共地下工作

者。1934年,省立七师(文登乡师)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校长于云亭被捕押解济南,王晚蓼得知后立即托人通过何思源疏通,由东方书社作保获释。济南解放后历任济南市文教局长、市政协副主席的于云亭晚年感慨地说:“在济南,西安、成都得到晚蓼和东方的帮助,我们是有缘分的。”由王晚蓼保释出狱,在东方书社疗养一个月后重返革命队伍、解放后任济南市副市长的历史学家许衍梁称赞说:“在大后方,东方书社是穷学生和遭难人的家。”

时代进入21世纪,东方书社的传奇故事已渐行渐远。今日你踱步泉城路上的新华书店,开架售书、微笑服务的传统依然保持传承着,这里仍然是爱书人读书购书的精神家园。



“七一”临近,纪念建党90周年的稿件纷至沓来,本期我们特地选了一组稿件,组成“红色记忆”专题。

——编者

64年前五龙河上惊险一幕

□张秀英

1947年初,我们这批当时的青年学生在“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鼓舞下,毫不犹豫地走出了课堂,从四面八方奔赴到革命阵营中,可胶东行署没有派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而是分配我们分别到各类学校去学习。我和几位同学被分配考入胶东建国学校学习财政经济业务,当时学校有师生200多人,分成若干小组进行学习和管理,学校驻地 in 莱阳县折步村,不久移驻在靠近“五龙河”东面一个叫“芦儿港”的较大村庄。

到了六月份,当地连下了几场雨,地瓜地里的杂草疯长,为了搞好群众关系,学校安排各班轮流帮助老百姓去地里拔草。一天又派了两个班的同学到五龙河的西岸地瓜地里拔草,地里黏湿,每个人都沾了一身泥巴。因此,老师规定劳动结束后,男女同学分先后到河里去洗澡。五龙河是一条自北向南流量较大的河,河水有深有浅,河东面是一片沙滩,可河西面有一段紧靠地堰高崖,那里水深流急。当年就在这段激流中发生了惊险一幕。

战争年代,我们驻防的村庄大部分都是铺麦草,睡地铺,没有条件洗澡,这次干完活后能到河里去洗个澡,大家都很高兴。都是

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喜欢热闹,到达河滩后迫不及待地穿着衣服就往水里跑。几个人高兴地手牵手结伴在河中戏水,正玩得兴奋之时,突然上游冲下来一股急流,霎时就把三位同学冲进了河中间,有人高喊“冲跑了,冲跑了!”又有多人高喊:“救命啊!救命啊!”大家一看果然有三个同学在急流中翻滚挣扎,当时我们这些女孩子都吓蒙了,连哭带叫,谁也不敢去救。这时我抬头看见西崖高地上有一位中年男子在干活,他听到哭喊声向河里看了看,但只摇了摇头没见他挪动步。我们眼看着三人在激流中挣扎,越来越远,就在这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从上游狂奔下来一位男同学,他叫宋素沂,来不及脱外衣就箭似的冲入激流中,一把把曲敏同学拉上了岸。接着他又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出十几米,把在激流中翻滚的宋玉兰同学救了上来。河里还有一位叫于孟君的同学,这时已随激流冲出约三十多米远,她身穿长褂长裤,我们眼看着她在狂奔的激流中上下翻滚,大家认定她没救啦,有的同学就高叫她的名字大哭起来。还是这位男同学,又奋不顾身地奔向远方的激流中,趁激流把人卷上来的一刹那,快速抓住她的一只胳膊,从水中拖了出来。当时她已昏迷,有的同学懂点溺水急救知识,立即在河



救人的宋素沂的单人半身照,是1948年留下的。

滩上把她放平,从她肚子里掏出很多水来。过了一会,她才缓缓地清醒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大家搀扶着她们回到学校向领导作了汇报。几天后,学校召开大会,领导在全校大会上表扬了宋素沂同学舍己救人的事迹,号召我们全体师生向他学习。说实话,当时如果没有他的舍身相救,三位同学后果不堪设想。

宋素沂同学比我们大几岁,视同学为兄弟姐妹,经常做好人好事。在生活上、学习中甚至行军



▲1987年同学聚会时拍摄,中为被救者于孟君,右为本文作者。

中谁有困难,他都跑前跑后帮助,还经常给驻地老百姓担水扫院子帮助干活。他还自愿帮助一位从敌占区潍坊跑出来参加革命的张新生小同学,张新生当年只有15岁。1947年8月份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学校疏散时也是他带着这位小同学去他家避难保护。那时,党组织不公开,都是秘密开会,后来我们才知道,宋素沂是一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48年1月,山东大部分地区已解放,在返校的路上,提起此事,我说:“宋大哥,当时你不会游泳,冒这么大的危险下河救人,你不害怕吗?”他坦然回答:“害怕也得救,共产党员不怕死!”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胸怀呀!

宋素沂同学在1948年济南解放时,被分配到粮食大队(也叫部)入城做接收工作,不久,淮海战役节节胜利他又被调派南下去徐州做接收工作,后留徐州工作。

时光荏苒,往事悠悠,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所发生的惊心动魄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值此建党90周年之际,我又忆起64年前“五龙河”上惊险的一幕,永远不忘这位同学不顾个人安危下河救人的高尚品质,被救人者更是念念不忘被救的恩情。

连霆主讲这一时期的党群关系。

时间:2011年6月25日(周六)上午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报告厅(二环东路2912号)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我的入党故事

□纪毅

我和我的丈夫高明志同志都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于1938年参加八路军,经过严峻的考验于1939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72年,但当年入党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1920年农历六月十四,我出生在招远县东杨格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跟着母亲背井离乡逃荒要饭。1938年7月,我参加胶东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三军二路)的军校。“九一八”纪念日那一天,接受统一番号: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从那天起,我军的战士统称为八路军战士。

1939年初春,学校向全体学员传达了中央关于从军队调一批军人到地方去开展工作的指示,主要任务是:到敌占区发动群众,动员参军参战,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我报了名。随即被调离军校参加地方工作队,脱去军装换上便装,被分配到招远县夏甸镇,以教学身份为掩护,实质是地下联络站的秘密工作人员。该站工作直接由招远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领导。我们的工作是以小学为基地,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校内利用课堂对学生进行教育,同时与教师交朋友,争取他们支持和至少不反对党在学校的教学方针。在校外,利用到学生家中吃派饭的机会,做不同阶层学生家长的工作,争取到一部分上层进步人士和我们一起宣传抗日救国。由于离伪军赵保元部较近,我每天换一个住处。白天教学,晚饭后教妇女识字班学文化,号召妇女走出家门抗日救国,不做亡国奴,教儿童团的孩子们站岗放哨等。我利用一切机会开展工作,记得夏甸镇有4个自然村,村中有一条大沙河穿境。晚饭后很多群众在沙滩上乘凉,我趁机教这些乘凉的男女老少学唱《流亡三部曲》和《大刀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很快和群众打成一片。工作开展得很理想,特别是一些平日不大出门的女孩子和小媳妇们都纷纷走出家门。

记得有一个15岁的姓尹的童养媳到学校找到我,含泪讲述了她苦难的身世,要我救她逃出苦海。我当即和她约定了在河东小树林接头,利用夜色掩护,将她送到8里外的八路军兵工厂,由教导员曲力同志将她留下。然后,我连夜赶回夏甸镇,从此一别48年再没见过一面。后来的日子,这位脱离童养媳苦海的女人嘱其孩子到处打听,终于在1987年由她的小儿子邵学鹏跟我取得联系,我们才又相见了。得知她在兵工厂入了党,还当了指导员。

在夏甸地下联络站工作期间,党组织对我进行了全面考察和培养,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对我进行了直接领导,根据我的工作表现,1939年4月5日那天,他郑重地向我宣布了吸收我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组织决定,并指定县妇联的李桂枝和教员范金堂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那一刻,我热泪盈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5月4日接到通知去离夏甸不远的柳仙庄当时的招远县长王德庵家,在他家的东厢房,由刘儒英同志主持会议为我们几位预备党员举行了入党仪式,我庄严地举起手来向第一次见到的标有镰刀锤子的鲜红党旗宣誓。随后,刘儒英同志带领我们诵读《国际歌》的歌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刘儒英同志对我们说:“共产党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视死如归,时刻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黎明前的黑暗,要看到中国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光明的中国一定会到来。”刘儒英同志严肃地公布党的地下工作纪律: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党员之间不能横向联系,不能谈论党内的人和事等等。最后和我们一一紧紧握手。从此我由一个爱国主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夏甸地下联络站的工作成为我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我永生难忘。

今年7月1日是共产党的90华诞,我也91岁了。往事如烟,招远县第一任县委书记刘儒英同志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可是他谦逊有礼、热情诚恳、平易近人的形象,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一次,在他儿子刘志强的信中,我告诉他,刘儒英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与日月同辉,与大地共存,我永远缅怀他。(作者曾任济南市委监察处长,烟台市委组织部部长,1983年离休。)

大众讲坛



到省图听讲座去

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大众讲坛预告

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什么全国最大

抗日战争期间,山东党组织“白手起家”,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了党领导的唯一的省政府。到抗战胜利之时,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的山东部分,人口3000余万,约占全国解放区近1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党员30余万,约占全国

党员总数120余万人的四分之一。这一时期党群关系发展的历史进一步昭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

本周六,由本报和山东省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大众讲坛将邀请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常